

都市与文化译丛
包亚明 主编

美] 萨斯基亚·萨森 著
季纯一 译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都市与文化译丛
包亚明 主编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美] 萨斯基亚·萨森 著 李纯一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及其不满 / (美)萨森(Sassen, S.)著;
包亚明主编;李纯一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7
(都市与文化)
ISBN 978-7-5458-0428-7

I. ①全… II. ①萨…②包…③李… III. ①全球化—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493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7-378

责任编辑 马 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全球化及其不满

萨斯基亚·萨森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428-7/D·15
定 价 22.00 元

“都市与文化”译丛序

全球化、消费文化与空间的政治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媒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列斐伏尔的“生产”概念，有别于经济学中被简约化为工业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全球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的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

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全球范围的城市化的发展浪潮,充分凸现了当代社会在时间、空间、人与全球事件的无缝连接方面的能力和必要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便捷地与他人联络。城市、国家、公司的功能与作用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围绕控制中心、理性主体,围绕城市、国家、公司以及居民、公民、资本家的全球性参与,共同建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在场。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被重建。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萨斯基亚·萨森同样关注全球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她认为全球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全球城市与跨国资本共同充当了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跨国公司从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而全球城市则从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成为全球化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萨斯基亚·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与一般城市不同,全球城市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萨斯基亚·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具有三大特征: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运作。全球城市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全球城市为节点,构成了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这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全球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和外来人士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比人口结构更重要的全球城市开放性指标是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包括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这种社会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全球城市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先决条件。

萨斯基亚·萨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

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大都市除了意味着人类的痛苦与绝望外,同时也意味着巨大财富的聚集之地和豪华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这些城市空间为跨国精英们提供了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对于跨国企业人士来说,一个有一流机场、黄金地段的商业区、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国。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象和讯息의 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

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让电视和网络把社会生活的信息直接送到面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同时,随着人与人工制品的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一种新的“无地方性”都市环境正在主导我们周围的城市空间,以及我们对于空间的认知能力。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无地方性”空间不仅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直接催生的,而且也成为了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展示空间。可以说,全球城市既是无地方性空间的集中生产之地,也是消费文化空前发达的辐射之源。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都市发展的特征性场所,如郊区的超大市场(大卖场)、商业购物中心、公共交通枢纽等,宣告一种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的诞生,这些场所和设施在都市生活中占据了新的显著位置。只要身处购物中心或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中,人的感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本雅明早就分析过如今购物中心的先驱——巴黎的拱廊商业街,他把巴黎的拱廊街看作是现代都市的一个寓言。广阔复杂的都市空间,即使对于城市游荡者本雅明来说也是令人晕眩的,因此,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莎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

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画面上的时候了。在《购物如何改变美国文化》一书中,莎朗·佐京深入剖析了城市空间中的商店这样一个特别的单元,以及购物活动是如何使商店变成一种“全面控制的机构”。

瓦尔特·本雅明在研究19世纪的巴黎时,早就将购物看成是影响城市生活精神领域的核心要素。本雅明在大量的笔记中写下了他对巴黎的商店、街道、市场、时尚的思考和研究,他尤其迷恋巴黎的拱廊商业街,拱廊商业街不仅显现了钢筋和玻璃建筑的历史,同时也表达了对时尚的迷恋和获取。在巴黎拱廊商业街中,混杂的人流形成了一个集市,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买卖,商品的催眠力量在此畅行无阻,世界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展览。本雅明认为正是购物行为使消费空间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空间。购物行为使得人类梦想乐趣的能力得到了展示、延伸和实现,而购物的对象——产品、货品、商品、服务甚至时尚本身,都已经成为了梦想的载体。购物行为使消费者有可能通过交易的形式拥有美丽、真实和完美的梦想,这一梦想既与完美社会的建构相关,同时也与完美自我的实现相关。购物不仅将经济中的结构性变化和一种新的自我觉醒制度化,而且同时创造了现代公众和一种现代公众文化。本雅明认为在拱廊商业街的消费空间中,大众在商品崇拜与购物氛围中,将个人消费的梦想演变成为一种政治的乌托邦式的集体幻想。

在莎朗·佐京看来,购物的消费空间就是当代社会的权力地形图,而购物已经成为毫无节制和疏远生活的重要比喻。零售业的巨大规模、商店的无所不在、对品牌的迷恋,这一切都使消费者无法避免购物具有说服力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规模和所有权、地理和技术的变化,购物的权力地形图也发生了变化,百货商店曾一度对时尚和价格施加了集中控制,如今却由于折扣连锁店和品牌专卖店而相形见绌,而大

卖场则回荡着成百上千家街角杂货店的幽灵。购物的消费空间不仅仅勾勒出一幅权力的全景图,同时,它也规训着我们的身心。在名目繁多的消费空间中,我们的购物活动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价值理念:低廉的价格定义了民主观念,品牌代表了对更好生活的追寻,设计师专卖店则蕴含着不断自我完善的希望。购物虽然是一个意义含混而又暧昧的领域,但它仍然是生活中我们自认为能够平衡创造和控制的一个领域;虽然我们无法在购物中真正做到“随心所欲”,但购物依然是一个避免工作和政治的自由领域;虽然购物的等级标识在现实生活中清晰可辨,但相比其他社会领域,购物仍然体现了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平等和民主;虽然我们在消费空间中受到各种因素的暗示、影响、干扰,甚至控制,但购物活动仍然锻炼了我们获得最价廉物美的商品的技能;虽然购物活动并没有带来充分和长久的满足,但我们仍然无法避免购物的诱惑;虽然我们对购物的本质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但我们依然无法逃离和摆脱购物。因此,正像莎朗·佐京断言的那样,作为对于价值的公共追求和私人追求,购物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文化。

消费文化将我们对美丽、平等和社会接受的最理想化的欲望,转变成一种对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对最好东西的追求强化了他们对购物的关切。但是莎朗·佐京提醒我们购物的自由体验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假设。消费者的满意其实是由购物“生产出来的”,是由于我们被允许在我们对完美的梦想和我们能够买得起的东西之间取得平衡。满意并不是仅仅由购物的短时行为保证的,也不是由试图说服我们购买意识所控制的。购物经历中包含的所有活动,其实推动了消费者对这整个商品生产和销售体系的接受,从而使得市场经济“被普遍接受”。购物以一浪推一浪的方式前进,它以获得更多商品、更高收入为标志,同时也创造了不同的消费文化。这些消费文化包含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将每一代的消费者和他们的父辈区分开来,它们同时还包含了一套新的机制,

使购物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最终更加无法抗拒。这些变化累积起来的效果是消费文化最终改变了消费者的世界观,消费文化说服我们将整个世界视为一种购物体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朗·佐京提出的“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莎朗·佐京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

索亚同样认为,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的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消费文化对于城市空间的征服,同时也放大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空间使用的不同要求。城市空间的巨大变迁不仅在物理向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外貌,而且同时在精神与意识的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城市空间在超乎通常现代化的发展观念和手段推动下,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猛地扩展着,这一过程既有合理的功能性的考虑,又同时受到梦幻式的想象与意象的引导。这一过程复杂地交织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各种因素,并将历史性的资源与地域性知识的重建过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核心不在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全球城市或准全球城市正不断地因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

总之,“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都市与文化”译丛》第一批五种译著:Michael J. Dear 的《后现代都市状况》、Jorge Larraín 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Edward W. Soja 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Sharon Zukin 的《城市文化》和 Edward W. Soja 的《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已在几年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新推出了四种译著:萨斯基亚·萨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莎朗·佐京的《购物如何改变美国文化》、迈克·戴维斯的《死城》、约翰·汉尼根的《梦幻城市》。希望这个出版项目能够有助于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2011年5月8日

序言

K. Anthony Appiah

通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男性与女性都在长途跋涉——为寻求贸易，为建立帝国，为改宗信仰，为找寻奴隶——以他山之石塑造各地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亚历山大帝国塑造的不仅是政治版图，亦有埃及和北印度的雕塑；莫卧儿人及蒙古人的铁蹄横扫亚洲；班图移民聚居半个非洲大陆。伊斯兰国家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在每个大洲都生机勃勃；佛教早年自印度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流传，现在欧洲、非洲以及美洲亦多有分布。犹太人、古吉拉特人、锡克教徒和中国人散居于全球各地。丝绸之路的商人改变了意大利贵族的衣着风尚；有人用中国的陶器做斯瓦希里墓冢的葬器。想想萨赫勒的曼丁哥商人，想想大航海时代的英国、荷兰、意大利和伊比利亚水手，或者第一个移居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家：我们是一个定居的物种，同时也是一个移居迁徙的物种。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和生活形式之间年深月久的相互渗透。但我们也必须接受，

在我们的世纪，二者间的平衡已被打破。定居者与迁徙者的比率在世界各地都已大不相同。现在“外来”的观念、物事和人群——越来越明显地——比过往任何其他时代都显得更为在场。称这一进程为“全球化”，如我们通常所做的，固然很好，但这道不出其中有何新颖，又有何意义。

萨斯基亚·萨森通过聚焦一系列全球化中重要而又通常被误解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向度，深化了我们对当下的理解。比方说，我们从她的研究中获知一个全球城市的新体系（不仅有纽约和伦敦，还有孟买、圣保罗和香港）和经济区的新类型（不止有硅谷，亦有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上的工业区）。本集的文章以她对全球城市的研究为基础，但同样也包括了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许多其他方面的深入分析。

全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其作为跨国经济帝国的控制节点和金融中心而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样也是对其全球角色而言具有特别的社会和物质前提条件的地方。它们并不像过去的城市，将其经济建立在地理相连区域的中心；恰恰相反，它们连接相距甚远的生产、消费和金融节点。确实，正如纽约州的政治一直以来提醒着居住于此的我们，全球城市也可以变得日加孤立——事实上，主动对抗——区域层面的文化与经济。

《全球化及其不满》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个如此分散的跨国体系需要如此集中其金融和管理？毕竟，如果“脑力工人”能够方便地进行“电子沟通”，又为什么在曼哈顿、东京和伦敦数平方英里的面积上拥塞着全世界那么多的电脑屏幕呢？萨森教授教会我们看透物质与社会的迷魂阵，这一阵局道出了例如纽约何以长居主导地位：这座城市的光导纤维电缆网络，大量（非常廉价）的家政和其他服务的劳动力储备，汇集（索价高昂）的法律、会计、金融专家，是如何一起解释了其是值得企业把广大的生产、消费和金融体系中的某些部分设立在仅此一地的。其他人无疑也注意到了这每一点，但萨森勾画了其中的复杂关系，巧妙发

掘了新全球城市中贫困集中与财富集中之间的联系，以及相距甚远的物质生产地和社会再生产地之间的联系，这便是计算机芯片和移民的来源地。最重要的是，她展示了劳动力的全球化流动乃是全球金融发展和全球资本循环的相同进程之一部分。

这一方法启示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新世界体系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视金融活动和国家管制贸易的自由化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动力来源，而与此同时在另一套话语里执意坚持移民管制的国家化体系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低薪劳动力的大量储备是纽约或法兰克福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且可获得的劳动力储备并不在美国或德国的公民之中，那么一个“后国家”的移民管制就会被当作与贸易和金融的“后国家”管制同等重要的政治计划（且事实上，那些处理城市实际政治经济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宣扬法治的共和党纽约市长现在言辞之间对非法移民惊人地友好）。

然而，萨森的研究揭示，所谓旧国家体系与跨国公司无关的想法是错误的。国际商法的整个构架依赖于国家体系的法院和国家及国际层面的仲裁体系，其基于国家意志而存在，并且要求国家体系来执行其决定。所以，妄断新的全球公司就这么逃脱了民族国家在先前两个世纪发展的管制形式是不对的。

不过，如果全球公司仍然通常处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其要比旧有的资本主义形式拥有更多规避管制的办法；而唯一有效的管制方法需要跨国行动。如果我们关心民主价值，我们一定会探索构建跨国界民主行动的政治基础的方式。对于民主的民族国家，管制的政治手法有赖于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这是一个国家与自己对话的一部分，其植根于家庭、教会、学校、大学、工会及如此等等的日常互动之中。如果出现一种新型跨国政治，那么跨越国界的话语将会植根于何处呢？萨森建议我们细察一下那些人的世界——如北方国家全球城市里的有

色移民——正如她所说的，“缺乏权力但现在‘在场’”（原书 p. xxi）的人。“我大部分研究的核心假设是，”萨森说，“我们通过权力的缺失，通过穿越连接无权力与权力这二者之间的边界与地带，而对权力获知一二。”（原书 p. 86）

无权力的，当然，大体上是穷人。萨森的研究吸引人们关注新经济正在创造的不平等的新形式，这是十分必要的关注。她的文章描述了在“全球城市的闹市区和大都会商业中心”进行“房地产和电子通讯的大规模投资”与低收入贫民区的开支短缺何以相互关联；何以主导部门诸如金融行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员目睹其收入大幅上升，而为他们打扫办公室或复印的人其工资却停滞不前或大大缩水。正如萨森教授想要汇集全球资本话语和移民话语（重新表述为劳动力的全球化），她也想让我们同时看到商业中心和贫困的内城。这是发生在世界各地全球城市中的现象，从伦敦到孟买，在北方国家之外也在其之内。如若有一种能够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的政治，那么它得把展现在全球城市中的天差地别的世界考虑进来。如果我们想要处理这样一个尽管植根于国家体制，却日渐超越国家管制的政治经济，我们就必须发展一个跨国联盟体系。

一种现已成熟的跨国交往的重要形式，是女性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和议程体系。在本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全球经济的女性主义试析”中，萨森教授探究了性别在移民、生产跨国化以及不平等新机制的形成方面的中心性。她作出了令人惊讶但（事实证明）相当值得的决定，即聚焦她所称的“主权的瓦解”，过去由民族国家掌理的管制进程，现在转让给“超国家、非政府或私人机构”（原书 p. 92）。对一些女性主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显示了这一瓦解可以给女性和女性组织带来新的机会，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形成跨国界的女性声援团体”（原书 p. 93）。如果回应我们新处境的跨国政治正在形成、发展之中，那么女性主义分析——及女性主义的实践——就为将来需要的那类国际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